



鲁迅研究丛书

迅魯于的可考論想

鍾敬文著



扉页题字 王天任

鲁迅研究丛书

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钟敬文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12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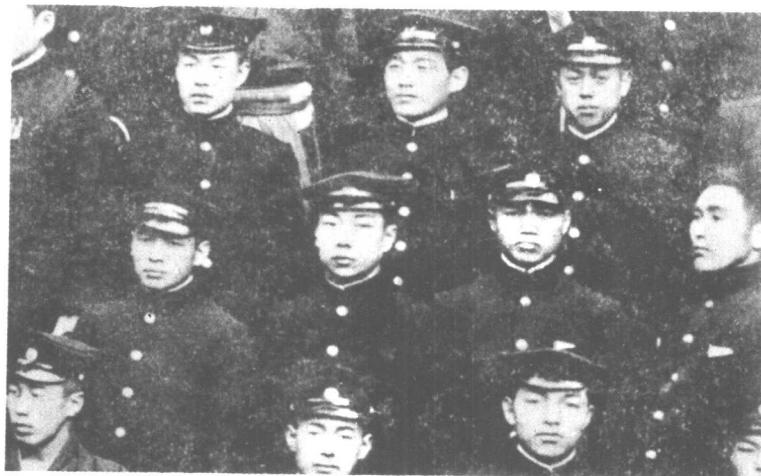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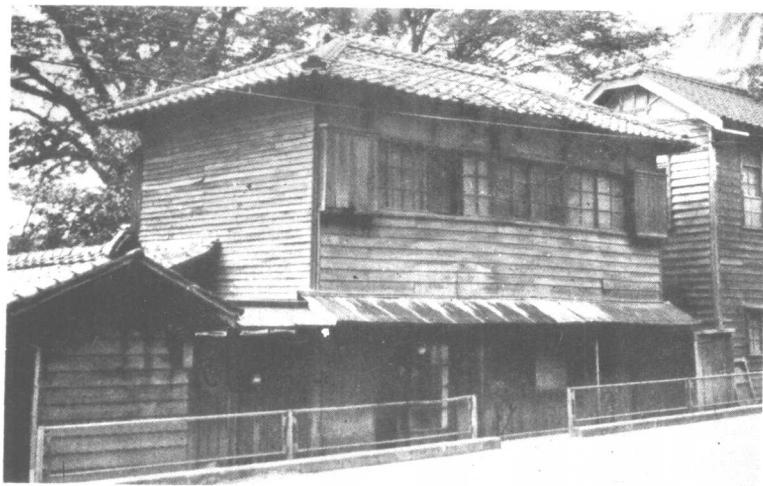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94·345 定价：0.85元



仙台市的鲁迅之碑（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完成）



鲁迅与仙台医专部分同学留影



鲁迅在仙台医专上学时的旧居

次 目

	先
月夜	美 國 蘭 真
不夜	法 國 亞 倫
摩訶末若	梵尼亞 波 塞 坡
天使	波 閩 顯 克 德 支 人
假幕守	俄 國 通 勒 沙 人
國日	俄 國 通 勒 沙 人
一文錢	斯 諦 著 庫 克

《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目录



鲁迅所译《月世界旅行》日文底本封面

日本新发现的鲁迅诗幅影片

潇湘何事等閒回
水碧沙明雨岸苔
二十五絃彈夜月
不勝清怨却飛來

本間先生教正

魯迅

尾同二十八日
心曖昧解剖學上之尾觀音ト云ノ言ハア
ダカラ尾同二十八日
及ニテ

鲁迅两行佚信

自序

一九一九年涌现的“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疾风怒涛”时代。它以强劲无比的威力摧毁了当时在我们社会里还占着统治地位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伦理，同时又茁长及传播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伦理。它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水岭。三十年后诞生了一个跨越前史的“人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就从那时候揭幕的。

象人类一切历史上的新运动一样，在它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出现一批新的杰出的领袖。鲁迅先生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出来，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崇敬的精神领袖之一。

本世纪的初年，鲁迅先生还在国外留学时期，他已经致力于进步的文化活动，为变革祖国的悲惨命运而奋斗。但辛亥民族、民主革命的失败，使他悲愤之余，暂时隐在古文献堆里去抄写古碑。“五·四”前夜，《新青年》的野火重新照亮他献身社会的赤心。“五·四”的惊雷更使他振奋了。他的武器（毛笔）是那样昼夜不停地挥舞着。除了教育部的公务和一些学校的教学工作之外，他不断撰写批评世相的杂

感文，创作意在改变社会现状的小说；他经常介绍国外的精神食粮，还精心编写那具有独创性的小说史讲义，………这些直到现在还在闪光的业绩，当时对于象我那样心眼初开，渴于求知的青年，无疑是产生相当影响的。如今回顾起来，鲁迅先生的著作中给我个人印象深刻和使我反应较强的，是那些见解入木三分，而语词锋芒又十分锐利的杂感文。我们活在那样的时代，所以多少能够具有比较正常的社会爱憎，还没有堕入那旧社会的泥坑，鲁迅先生那些体积短小，而轰炸力强烈的杂感文是有功劳的。他是中国近代社会里黑暗面的传神写照，同时又是对旧世界的控诉书和判决书。

虽然接触鲁迅先生光辉的精神作业相当早，而且方面也不算太窄。但是，我得承认：对他作为一个社会战士的卓越作用等的科学认识是比较迟的，对于他著作成就中的某些方面（例如小说史等）和他的学术经历及传记上的一些问题，也直到近年才认真给以思索或探究。

由于上述这种原因，使我在着手编辑这个文集时，不免一再感到忸怩，乃至于有些踌躇。

这个集子，收录了过去我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学艺、传记等方面的部分文章。它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杂文集”（“杂文”这个词，用它在我国文献上原来的涵义）。从体裁上看来，既有千把字的通信（如《关于“树的党”的信》），也有篇幅较长的议论文（如《关于〈自题小像〉的二三问题》、《鲁迅在弘文书院到底学些什么》等），还有那些访问记、回忆录及年表之类的东西。从写作的原因

看，有些是为了辨明被误解的问题（如关于鲁迅先生在弘文堂学习内容等题），有些是为记述当时接触的印象，也有的是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或应付编辑同志的索稿（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增田涉教授》等），……如果从写作时间的距离看，那就不免要使有些同志感到惊异。最早的《记找鲁迅先生》，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而其他不少文章，却是近年所撰写的。这样的一个集子，怎么能够不象个杂货摊呢？

这个集子里长长短短近二十篇文章，彼此文词的风格固然很不一样，内容也不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果要一一加以改易，那么，有的篇章就不免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是唯物的历史主义者，还是让它们大体上仍保存着原来的样子罢。

在这里，我想对这个集子的某些文章作必要的说明，并顺便谈谈我这个方面的“未竟之业”——它也许永远是我学艺上的“未竟之业”了。

这个集子里，有一些谈论鲁迅先生作品的文章，如《鲁迅归体诗歌略说》、《略谈〈野草〉》，写法是跟一般论文不一样的。我应该说明它们产生的原因。大约六、七年前，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组，拟开讲“鲁迅”的专题课，我负责撰写了一部分讲稿。因为不是一般的 research paper，而是要面对大都没有学过鲁迅先生著作的大学生讲述的，所以在讲稿行文上采取了“概括论述”和“举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这就是它们写法颇为特殊的由来。这些讲稿，当时运气很不

佳，在它写成后正要开口去讲述的时候，当头涌起了气势凶猛的“反翻案风”的黑潮。当然的结果，它只好被闲置在教研组的抽屉里了。现在全国学艺界正在给鲁迅先生作诞生百年纪念的时候，我的这些一时被抹煞了的讲稿，有机会汇集在一起，作为一瓣心香贡献于我们伟大作家的英魂之前，这是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我还联想起一段旧事。一九三六年夏间，我从东京回到祖国。为了便于搞民间文艺方面的搜集、研究工作，我仍然住在比较熟悉的杭州。这年十月二十日，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霹雳一样，震惊了我国学艺界——特别是进步的学艺界。我们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那时，浙江图书馆的馆刊，拟发表一些追悼的文章，一位在那里编目组工作的中大老同事，来请我执笔。我自然应命写了。据说文章已经上了版，但是，该馆忽然接到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不准刊登这类文章。我的原稿也终于没有取回来。它象俗话所说的“石沉大海”了。在那黑暗时代里，这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不过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证明那些猫头鹰是怎样怕见光明的罢了。现在，它却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今昔社会明暗的对比：当时鲁迅先生刚逝世，刊物上连追悼的文章也不准刊登；现在，鲁迅先生逝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文化界和广大人民都要以全国性的规模，纪念他老先生的百岁冥寿！而我个人现在所要公刊的不只是是一篇哀悼的小文章，而是一个文集！这充分说明邪恶的统治力量是很有限的，最终胜利的总是正义与公道！你们可曾看见那永远为乌云遮蔽住

的天空？

我还要说一点我此刻感到的遗憾。在“四人帮”未倒台的前一两年，我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各高等学校给《鲁迅全集》作新注的工作，由于这时对鲁迅先生的著作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因此，引起自己思考一些有关的问题。在这前后，我也试写了一些小论（大都收入这个集子里），但是，还有一些论题，我已经给自己提了出来，并且在积极收集资料，以便进一步分析、研究。（这方面的论题，如《鲁迅与苏曼殊》、《鲁迅与科学小说》、《鲁迅留学时代的前后期思想》等。）有的论题，在收集资料上，还麻烦了国际的学界朋友，例如我现在的一些资料袋里，就装着松枝茂夫教授为我复印的关于鲁迅先生当年据以翻译的日文《月世界旅行》的封面与目录，实藤惠秀博士为我复印的山本初枝女士的年谱及她所写关于鲁迅先生书信的文章，……这些在国内不大容易见到的资料，现在大都只好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耗子们去磨牙齿，想起来实在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正如孟轲说的，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只好弃鱼而取熊掌。我把想写的这方面的论文搁在一边，并不是它不如民间文学方面工作的重要（如熊掌的胜过鱼那样），只因为后者是我多年来所从事的专业，而此刻在我们学术界里，这方面的人手又是那么少（跟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和生平的比较起来）。尽管这样，我现在想到这点，还是很记挂着那被搁置起来的关于鲁迅先生传记和著作的研究工作。如果今

年来我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兼顾它，至少，这个文集，可以不致象现在这样寒碜吧？这种遗憾，将是长时间地使我耿耿于心的。

最后，让我说明一下这个集里文章的分组编排。为了使它看起来比较有条理些，共分为四组。第一组，是关于一般诗歌的；第二组是关于散文和散文诗的；第三组是关于传记的；第四组是关于访问、回忆等的。末了是几篇小诗。文章本来不是为了被分类而写作的；文集里的分组，也只为了读者查考和阅读的方便，并不是什么严格的科学的分类。这个分组，开始是朱金顺同志拟议的，杨占升同志复看这些文稿时，也同意这样分法。我最后编定时，只对组与组间的前后位置做了一点移动。除了上述两位同志在审阅文稿和编组等方面出过力之外，刘锡庆同志曾为接洽出版和多次催促我编辑这个集子；在抄校上，谷兴云、梁木森同志也给以不少帮助。最后，文稿送到出版社时，在编辑体例上，由编辑部同志作了一些变动，主要将原“附录”部分的通讯放在有关文章之后，这样就显得较完整统一了。在此谨用自己的名义和代表读者向上述诸位同志致诚挚的感谢。

钟敬文

1981.5.4 改完

目 次

自序	(1)
鲁迅旧体诗歌略说	(1)
关于《自题小像》的二三问题	(16)
关于《自题小像》问题的复信	(47)
附：谈论《自题小像》问题的通讯	(54)
《赠日本歌人》诗幅照片说明的补充	(58)
附：关于鲁迅的《赠日本歌人》(内山嘉吉 实藤惠秀)	(65)
关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68)
鲁迅诗话 (七则)	(75)
略谈《野草》	(85)
谈《朝花夕拾》	(99)
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些什么	
——对“学习日语说”的商榷	(117)
关于鲁迅传记、书简的两个新问题	(137)
《中国小说史略》与增田涉教授	(146)

鲁迅留学时期年表	(159)
附：后记	(173)
《鲁迅年谱》译后记	(177)
记找鲁迅先生	(180)
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	(184)
对《读书与革命》的处理问题	(191)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一个问题	(194)
关于“树的党”的信	(206)
附：关于甘乃光和“树的党”的通讯	(208)
七绝三首	(210)

鲁迅旧体诗歌略说

(一)

鲁迅诗歌方面的创作，除了散文诗《野草》之外，还有新诗和许多用民族固有诗歌形式（包括民间歌谣形式）的诗篇。新诗六首，后者数十首。这些诗篇，数量不算多，但质量却相当高。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为人民大众的作家“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引用了鲁迅《自嘲》诗里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已。”到了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又亲自写了鲁迅的《无题》绝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以勉励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的日本人民。这些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它充分表明鲁迅这方面的创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鲁迅的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是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兼革命

家的整个文学业绩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

鲁迅的新诗，作于《新青年》时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在当时和稍后的文坛上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自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因为除了数量较少的原因外，跟他的小说和杂感文等比较起来，这方面的成就和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尽管如此，作为新文学运动发动时期的韵文创作，却占有一个自己应得的位置。（我们知道：新诗的创作和它的理论建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重要的一翼。）

首先，鲁迅这些新诗，每首都含有一种新意或深意。它不愧称为当时的“新诗”。区别于用传统思想、情绪和形式表现的“新诗”。例如《爱之神》是颂扬爱情自由，呼吁大胆摆脱旧礼教的束缚的；《他们的花园》是痛恨旧思想、旧习惯对外来的新事物的污损的；《人与时》是强调重视“现在”，批判那些留连过去和空想未来的想法的；《梦》是号召作“明白的梦”，而抛弃那些“墨一般黑”的过去的梦的；………这里所表现的，都是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积极的、壮健的思想、感情，是与当时整个前进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同时它又是对于那种精神的鼓吹和促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精神因素，是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的鲁迅所夙有的，在他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它并不象当时某些作家作品里的新思想那样，是一种水上浮萍，是临时批叛来的思想货色。

其次，鲁迅这些新诗，在表现形式上，也具有它的特色。在语言上，他用了比较纯粹的口头语。在语句的安排

上，具有一定的整饬性，并且在音韵上具有相当的节调和押着相当谐和的韵脚。这种语体诗的创作方式，跟他后期在通信里回答关于创作新诗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他说：

“新诗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一九三四年，致窦隐夫信。另外在答蔡斐君的信里，也有近似的话。）当新诗诞生后的一段时期里，诗坛上曾出现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极端的散文化，起码的节调也没有，韵脚更不用说了。这是“自由派”。另一种是词藻和句法等还相当受旧诗词形式的束缚，不能显示出新的气昧。这是“改组派”（或者说“放脚派”）。鲁迅新诗的形式，是超越了这两种偏向的。它的作法，不但在当时是健康的、正确的，就是在此后新诗的发展上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

鲁迅在诗歌方面（除散文诗外）较大的贡献，主要还在那些用民族传统形式写作的诗篇，包括用歌谣体的创作在内的旧体诗歌。

鲁迅这方面的创作，一九〇〇年，他在国内当学生时代已经开始（据现在所保存下来的资料说）。一九〇三年，到了在日本留学时，他所作的《自题小像》绝句，不但具有在他个人思想发展上重要的史料意义，也是当时一般先进知识分子爱国和企图改革旧社会的思想的代表。从他诗歌方面的创作历程说，这又是一块矗立的纪念碑。但是鲁迅这方面主